

现当代文学研究

一种地方性书写,以汪曾祺为方法

孙生民

摘要: 学界对汪曾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位置已基本形成共识。以汪曾祺为方法,从汪曾祺的文论与创作入手,探究汪曾祺认知并继承的古今中外文学传统,揭示汪曾祺在与现实遇合中进行的创造性转化,构建起以风俗画、散文化、和谐美为主要支柱的汪曾祺文学传统,对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汪曾祺;里下河文学流派;风俗画;散文化;和谐美

学界对汪曾祺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位置已基本形成共识。承前,那便是鲁迅、废名、沈从文、萧红、师陀等开辟下来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①《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鉴赏家》《徙》等小说的发表,赓续了现代小说的抒情传统。启后,谈到寻根文学和里下河文学,都要追溯到汪曾祺先生。^②叶兆言说,汪先生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影响了一代作家。^③格非在一次访谈中提及汪曾祺说,当代文学里有两个被文学史忽略的重要文学形象,一个是汪曾祺,另一个是朦胧诗,他觉得这是先锋小说的两个比较近的重要源头。^④王尧在《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中说,汪曾祺的意义,在于连接了文学的“旧传统”和“新传统”,在断裂之处弥合了“文学遗产”^⑤。

我们要重视汪曾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

文学场中的作用。一是对于寻根文学来说,他“但开风气不为师”;二是对于里下河文学来说,他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后起之秀们学习致敬的对象,是他们自觉竖起的文学旗帜。本文重点探讨的是,汪曾祺继承并建构了哪些文学传统,这些传统又如何影响当代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 ① 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23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 ② 张诵圣:《开近年来文学寻根之风——汪曾祺与当代欧美小说观相颀颀》,《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5期。
- ③ 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山》,《群莺乱飞》,第10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 ④ 格非、李建立:《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先锋小说》,《南方文坛》2007年第1期。
- ⑤ 王尧:《重读汪曾祺兼论当代文学相关问题》,《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

汪曾祺从何而来,究竟继承了哪些文学传统?他在不同文本的自述里交代了自己的来路。《自报家门》里说,幼时,祖父“教过我读《论语》,还教我写过初步的八股文”^①。也曾师从乡贤韦鹤琴先生学桐城派的古文,深入其心,“一直认为‘桐城义法’是有道理的”^②。谈到小学五年级到初中毕业的语文老师高北溟,其自得与知遇之情如在目前:“在他所授古文中,我受影响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气质很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③《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创作生涯》里说:“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我的作品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影响的痕迹比较明显。我以为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作家,都会或多或少地接受这样那样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孔子的影响,老庄的影响,甚至佛教禅宗的影响。”^④他曾感慨:“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⑤他认为儒家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自称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⑥。可以说,所有这些都为汪曾祺的一生打下了底子,日后在汪曾祺的创作里不时呈现。

在《晚饭花集》自序中,汪曾祺说到了他的创作渊源:“我写短篇小说,一是中国本有用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事的传统……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庵的《记王隐君》,我觉得都可当小说看。……第二是我过去就曾经写过一些记人事的短文。当时是当作散文诗来写的。”^⑦在其他谈文说艺的文章里,汪曾祺又谈到了对宋词的喜好,以及词的抒情给他的创作带来的“隐隐约约的哀愁”^⑧。以往的研究者认为汪曾祺的创作更多源于中国文学诗骚以来的抒情传统,其实汪曾祺的创作与史传的叙事传统也密不可分。王干先生在《汪曾祺与〈史记〉》里,从实材、列传、异秉三方面具体阐释了汪曾祺与《史记》的联系。^⑨

汪曾祺曾反复谈到归有光对其影响极大。认为“他写人事写得很平淡”,“我认为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平平淡淡的叙述,平平淡淡

的人事,在他笔下很有味儿。”^⑩“我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我认为他的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像契诃夫。”^⑪其实,汪曾祺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正是来自归有光、契诃夫。

这就自然说到外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汪曾祺坦陈自己受影响较大的外国作家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左林,读了一些弗金妮亚·沃尔芙、普鲁斯特的作品,早期小说明显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⑫他认为契诃夫开创了短篇小说的新境界。小说“从重情节、编故事发展为写生活、按照生活的样子写生活。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为散文化的结构。”^⑬从这些对契诃夫的解读,可以看出汪曾祺深受契诃夫小说观影响,明确和坚定了自己日后小说创作的趋向。

关于民间文学,汪曾祺说:“我还搞过曲艺,编过《说说唱唱》;搞过民间文学、编了好几年《民间文学》。……不读一点民歌,民间故事,是不能成为一个好小说家的。”^⑭“民间故事丰富的想象和农民式的幽默,民歌的比喻新鲜和韵律的精巧”对文学创作不无启迪与借鉴意义。^⑮这些当然与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有关,也与他做过《民间文学》的编辑,曾与赵树理共事分不

①③⑤⑥⑧⑩⑫⑮ 汪曾祺:《自报家门——为熊猫丛书〈汪曾祺小说选〉作》,《汪曾祺全集》第5卷散文卷,第105、107、111、112、108、109、1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② 汪曾祺:《一个暑假》,《汪曾祺全集》第6卷散文卷,第1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④ 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创作生涯》,《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4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⑦ 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2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⑨ 王干:《汪曾祺与〈史记〉》,《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第117-131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

⑩ 汪曾祺:《关于作家和创作》,《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5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⑪⑬ 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317、31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⑭ 汪曾祺:《两栖杂述》,《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20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开,这种民间立场和眼光使他日后以里下河为方法看待世事,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

可以说,汪曾祺在解读前辈作家时确立了自己的文学谱系。说到中国现代作家,他认为,“中国五十年代以前的短篇小说作家不受鲁迅的影响的,几乎没有”,他曾想将鲁迅的小说和散文逐句逐段地加以批注,^①并“坦然欣赏”自己是沈从文之后的京派传人。^②

汪曾祺在《废名小说选集》序言里说,废名用写诗的办法来写小说,不写故事写意境,富于同情心,以儿童视角观察周围世界,从生活里发现意识流,他的小说是天真的,具有天真的美。^③这些解读废名小说的知音之言,或者说这些小说方法,其实更像是汪曾祺的自我解读。

而沈从文对汪曾祺的影响,从19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就已开始,抑或更早,汪曾祺报考西南联大正是冲着沈先生去的。沈从文是汪曾祺的发现者,知遇之恩隐约可见于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系列文章的字里行间。真正理解沈从文创作和文学观念的并不多,但汪曾祺一定是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从1980年代初,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末,汪曾祺先后写下十多篇解读沈从文的文章。正是解读沈从文引发了汪曾祺的创作冲动,“他的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特别是他笔下的那些农村的少女,三三、夭夭、翠翠,是推动我产生小英子这样一个形象的一种很潜在的因素。”^④沈从文作品里的人物启发汪曾祺创作了《受戒》,基于此,汪曾祺、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也许就构成了某种“互文”关系。当然,汪曾祺的“再解读”和“再创作”之间或者还有某些潜在的深层次关系。^⑤汪曾祺在解读沈从文的过程中为自己的创作寻找到文学传统,从而确定了自己的文学理想:“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⑥

汪曾祺不仅仅是在接受传统,更进一步说,他还在主动建构自己的文学传统。他主张“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认为“这种现实主义是要能够容纳其他很多流派的现实主义,这种民族传统是能够吸收一切东方和西方影响的民族传统”^⑦,希望能做到“纳外来于传统,不今不古,不中不西”^⑧。比如1940年代的小说《复仇》,是带着比较浓厚的洋味儿的,有相当多的

意识流,表现的却是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中国主题。比如1980年代的小说《大淖记事》里巧云被奸污之后,她飘飘忽忽地想了一些事情,想起了母亲,远在天边的母亲,母亲在给她点一点眉心红;想起她小时候去看人家新娘子,新娘子穿的粉红色绣花鞋;想起她手划破了,十一子给她吮指头上的血,她想那血一定是咸的,思绪都是飘飘忽忽、跳跃的。这些意识流,目的是表现巧云失去童贞之后的无奈心情,但是以一种优美暧昧的方式来表现的。因此,他在《〈晚饭花集〉自序》中称自己的创作为抒情现实主义。^⑨

二

汪曾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主动建构自身的文学传统与美学风格。考察汪曾祺的创作以及谈艺论文的文章,发现其风格主要集中在风俗画、散文化、和谐美三个方面。

风俗画主要从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着眼,是汪曾祺反映故乡里下河地区生活风貌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也是其笔下人物活动的舞台。可以这样说,里下河的河水启发了汪曾祺的想象,形成了他小说的特色。一般来说,汪曾祺最好的小说是写家乡的。他用家乡里下河地区的高邮作为背景,写熟悉的旧人旧事,

- ① 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317-3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② 吴福辉:《汪曾祺坦然欣然自认属于京派》,《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2期。
- ③ 汪曾祺:《〈废名小说选集〉代序》,《汪曾祺全集》第10卷谈艺卷,第382-3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④⑥ 汪曾祺:《关于〈受戒〉》,《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149、1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⑤ 凌云岚:《“夫子自道”——汪曾祺的沈从文解读》,《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
- ⑦ 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2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⑧ 汪曾祺:《自报家门——为熊猫丛书〈汪曾祺小说选〉作》,《汪曾祺全集》第5卷散文卷,第1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⑨ 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29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来呈现这个地方小人物日常生活中的“恒”与“变”，以及喜怒哀乐。无论是《异秉》《鸡鸣名家》，还是《故里杂记》《故乡人》《故里三陈》《晚饭花》等都有大量关于里下河地区的风土人情、婚丧嫁娶，这些都成为汪曾祺小说的肌理和血肉。汪曾祺小说有一个贯穿性的主题：“我希望在普通人的身上看出人的价值，人的诗意，人的美。”^①在《谈谈风俗画》里，汪曾祺认为，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②。他进一步阐述风俗与人的关系，认为“小说里写风俗，目的还是写人”^③。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肺腑之言，很容易在其创作里找到佐证。

小说《大淖记事》前三节，都是记风土人情，交代“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非标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这里的风俗仿佛成了一只看不见的手，主宰着这里人们的命运，抽象的伦理准则才会服从这里的现实诉求。小说写到十一子被刘号长打伤之后：“十一子微微听见一点声音，他睁了睁眼。巧云把一碗尿碱汤灌进了十一子的喉咙。”尿碱汤是里下河人治疗被打伤人的一个偏方，大家约定俗成这样做。但接下来作者出于感情，忽然写了一句：“不知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一细节，可为沈从文先生所说的“要贴到人物来写”作一注脚。巧云的这一举动是自然而然的，也可说是必然的，当地的风俗习惯决定了人物的选择。

小说《受戒》用抒情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小和尚与村姑的恋爱故事，超凡脱俗的苦行僧生活与逾越“门禁”的偷情世俗生活共生共长，表达了对美、健康人性的礼赞。小说明写受戒，实写破戒。只有在庵赵庄、荸荠庵这样的环境下，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人物，才有可能建构起作者的美学理想。不妨来看看小说《受戒》的结尾：紫灰色的芦穗，通红的蒲棒，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开着四瓣的小白花的野菱角，惊飞的青桩。这一切是里下河地区常见的风景，看似是顺乎自然的恬淡境界，其实蕴含着盎然生机。这里的风俗画不仅仅是人物的背景，更是

作品不可或缺的部分。

汪曾祺小说的另一个特色便是散文化。汪曾祺小说被称为“散文化”的小说，这一说法得到了他本人的首肯。他认为，小说散文化主要体现在结构与语言上。在谈到小说的散文化时他这样说：“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一的）趋势。”^④他列举了屠格涅夫、都德、契诃夫、阿左林、萨落扬、鲁迅、废名、萧红、沈从文的小说来佐证，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有一点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说则像水”^⑤。散文化的小说一般不写重大题材，不过分地刻画人物，最明显的外部特征是结构松散。他在自己小说集序言里说：“我的小说另一个特点是：散。……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苏轼说：‘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文说》）。”^⑥在《自报家门》里又说：“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我在一篇谈小说的短文中，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后来加上“苦心经营的随便”^⑦。他认为小说的结构是更内在的，更自然的，可用节奏来代替结构。其实，“文气”就是内在的节奏，是比结构更为内在、更为深厚的概念，和主题意蕴有机联系。小说要追求“血脉流通”“气韵生动”的境界。^⑧这些古代文章家的诗学理想，正是汪曾祺向往的作文境界。

① 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创作生涯》，《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4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②③ 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299、3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④⑤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392、3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⑥ 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1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⑦ 汪曾祺：《自报家门——为熊猫丛书〈汪曾祺小说选〉作》，《汪曾祺全集》第5卷散文卷，第1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⑧ 汪曾祺：《小说笔谈》，《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1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汪曾祺不喜欢故事性很强的小说,他要打破小说、散文和诗的界限,认为“散文文化的小说所写的常常只是一种意境”,往往都有点怀旧的调子,甚至有点隐逸的意味。^①“以为气氛即人物。”^②他的《异秉》《徙》《晚饭花》《故里三陈》等小说不大像小说,有些只是人物素描。他认为,写小说,就是写回忆,《受戒》甚至是“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汪曾祺是当代非常注重文体的小说家,认为“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语言是浸透了内容的,浸透了作者的思想的。”^③“探索一个作者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观念),必须由语言入手。”^④语言的美不在句子,而在语境,在于句与句之间的关系。“语言像树,树干树叶、汁液流转,一枝摇了百枝摇,它是‘活’的。”^⑤

他告诫小说家要潜心于语言,认为小说除了语言,就不存在。文章对于生活的态度要在字里行间自然流出,要注意语言对于主题的暗示性,不要把价值观、倾向性“特别地说出”,而是“在叙事中抒情,用抒情的笔触叙事”^⑥。

和谐美是汪曾祺小说追求的审美立场与价值倾向,也是汪曾祺区别于其他现当代作家的风格标识之一。纳博科夫认为,风格不是一种工具、方法、措词问题,它是“作家人格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或特性”,涉及“艺术家的独特品质及其他在他的艺术作品中的表现方式”^⑦。汪曾祺的和谐美学体现在“人间送小温”的人道精神、关注小人物的悲悯情怀、观照日常生活的诗意美学诸多方面,这是由一个作家的气质与阅历决定的,也与作家的成长环境息息相关。他在《七十书怀》里总结自己的创作为“文章淡淡忆儿时”^⑧,这说明他主动追求这样的文章风格,也对这样的风格有相当的自信。他对自己小说的“淡”带来的种种非议,也曾自我辩解道:“说我淡化,无非是说没有写重大题材,没有写性格复杂的英雄人物,没有写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但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我只能写我所熟悉的平平常常的人和事,或者如姜白石所说‘世间小儿女’……这结果就是淡。”^⑨这些

都说明他的创作与当时主流文坛流行的小说主题、样式不同,也是自身甘处边缘、清醒自觉选择的结果。此后他又多次在不同文章里解释这样的定位:“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⑩“我是个安于竹篱茅舍、小桥流水的人。以惯写小桥流水之笔而写高大雄奇之山,殆矣。”^⑪

在《谈风格》这篇文章里,汪曾祺谈到自己文章风格所受的影响。“作家所偏爱的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成为他的个性的一部分。”^⑫一个作家,在谈论别的作家时,谈的常常是他自己,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六经注我”。他如数家珍地交代了归有光、鲁迅、沈从文、废名、契诃夫、阿左林这些作家对他风格形成的影响,说到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汪曾祺曾引用古人黄梨洲、姚鼐、王锡爵、王世贞谈论归有光的文字,认为归有光的文章“一往情深,每以一二细事见之,使人欲涕”,“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不

- ① 汪曾祺:《小说的散文化》,《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39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② 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1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③⑤ 汪曾祺:《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438、4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④ 汪曾祺:《自报家门——为熊猫丛书〈汪曾祺小说选〉作》,《汪曾祺全集》第5卷散文卷,第1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⑥ 汪曾祺:《小说笔谈》,《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1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⑦ [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第6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 ⑧⑨ 汪曾祺:《七十书怀》,《汪曾祺全集》第5卷散文卷,第220、2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⑩ 汪曾祺:《门前流水尚能西——〈晚翠文谈〉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38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⑪ 汪曾祺:《泰山片石》,《汪曾祺全集》第5卷散文卷,第3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 ⑫ 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3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事雕饰而自有风味”^①。从这些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汪曾祺文章所追求的平淡,不是淡而无味,而是惨淡经营的平淡,别有深情深意寄托。如果我们认真咂摸汪曾祺作品,比如《职业》《异秉》《徙》《鸡鸣名家》《晚饭花》等,就像口含橄榄,回味无穷。可见汪曾祺小说“淡”的魅力。

对于平淡自然的文风,汪曾祺这样袒露心迹的:“在文风上,我是更有意识地写得平淡的。但我不能一味地平淡。……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结合起来。……我追求的是和谐。我希望溶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传统,能把它们揉在一起。”^②他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里直接说出了自己的美学倾向:“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③因为和谐美学的追求,那些奇崛、新奇就只有消融于平淡之中,如盐在水,这可谓是汪曾祺的美学野心。

如此,汪曾祺在接受古今中外多方面文学传统时,通过与现实的遇合,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建构起独特的文学传统,而风俗画、散文化、和谐美显然是其文学传统的三根重要支柱。

三

汪曾祺不知疲倦地写故乡里下河地区的高邮,风俗画、散文化、和谐美这种具有鲜明美学风格的叙写让里下河成了一个被文学发现的地方,也让里下河成为乡土中国的象征,这种人与地的关系被段义孚称为恋地情结。因为故乡是他的衣胞之地,是青春与记忆的储藏之所,对故乡的依恋使得“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④。里下河地区的后来者,以汪曾祺为方法来描写里下河,使里下河成为当代文学最为风光的文学地理区域。毕飞宇的王家庄、刘仁前的香河、鲁敏的东坝、朱辉的白驹、顾坚的大顾庄、刘春龙的垛上、周荣池的南角墩、肖德林的杨树庄等,这些曾经埋在里下河地区常见的地方,成了用来表达、承载后来追随者思想情感的载体,形成了里下河文学流派。

当然,里下河是一个地理概念。她不是一条河,而是由四条水系构成的一个区域,是苏中地

区里河与下河之间区域的简称。里下河又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同时还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是江淮之间一处具有丰富历史底蕴的文化空间。

这里的历代文人重视经史文章诗词歌赋的传诵与研究,是宋代婉约词宗秦观、明代散曲大家王磐的故乡,曾经诞生过施耐庵《水浒传》、吴承恩《西游记》、陆西星《封神演义》、李清《明珠缘》、蒲松龄《聊斋志异》、宣鼎《夜雨秋灯录》等小说,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基因。明代“泰州学派”“百姓日用是道”的主张,体现了里下河文人普遍关注大时代之下小人物的命运,醉心于日常生活的美学,他们的生存姿态与生活方式更多在民间传统与伦理中得以呈现;清代中期的“扬州学派”,沉浸于义理、考据、辞章等学问之余,注重追求文人士大夫情调,讲究文人品行与节操,保持了知识分子心忧苍生的传统。这两种传统与居主流地位的庙堂政治传统形成微妙的对话与平衡关系。清代的“扬州八怪”,特别是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张扬个性,以“小品”方式着墨、行文,更加凸显了里下河地区文人的艺术旨趣和审美风尚。清光绪年间刘熙载的《艺概》更是一部古典美学的经典著作,既注重文学本身的特点、艺术规律,同时又强调作品与人品、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所有这些使得里下河相对于其他地方更加具有时间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自足性。

从1940年代起,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受老师沈从文“京派”小说影响,开始书写反映故乡里下河的小说,并且对小说创作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汪曾祺写得最好的小说还是1980年代描写故乡高邮的一系列小说,故乡的贩夫走卒、能工巧匠、乡贤名流一一走进作品里,操着里下河人特有的腔调,唱着里下河民间小调和歌谣,行走

① 汪曾祺:《谈风格》,《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316-3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② 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2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③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4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④ [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志丞、刘苏译,第14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在里下河地区熟悉的村镇中,为生活恣意而忙碌地奔走。这里有相濡以沫的岁寒三友,知音相惜的果贩与当地名画家,离不开故土惨遭命运玩弄的几代文人,也有身怀绝技的各种手艺人,更有小和尚、小锡匠等小人物的爱情悲欢。当然,在这些作品里也不时徘徊着里下河地区文化精神的代表——故乡先贤名流的身影。其中,以“怪”见长的诗书画大家郑板桥最为突出——《故里杂记》里有人唱板桥道情,《徙》里高北溟“讲了一篇《潍县署中寄弟墨》,把郑板桥的几封家书、道情和一些题画的诗也都印发下去”,《故乡的食物》里干脆介绍“郑板桥是兴化人,我的家乡是高邮,风气相似。这样的感情,是外地人们不易领会的”。汪曾祺文章里喜欢引用板桥的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来表明自己的创作追求;汪先生喜欢写“一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这样的对联,小说《钓鱼的医生》里也引用过,表达钓鱼的医生日常生活的诗意境界,这也是郑板桥的句子。里下河文化、故乡先贤的美学趣味内蕴于其作品的肌理中、血肉里。

最先受到汪曾祺小说启发的是陆建华、沙黑、费振钟、王干、毕飞宇、刘仁前、刘春龙、顾坚、庞余亮、子川等人,在随后的几十年间,一大批里下河作家,以书写里下河相继登上文坛,形成里下河文学现象。这些后来者,在解读汪曾祺时,自觉将自己的创作归入“汪味”散文化小说,形成了蔚为大观的里下河文学流派。

吴泰昌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地方能出作家群不容易啊……这个地方……要有文学领头雁……高邮兴化有汪曾祺暗暗领过头,尽管他不认可这种说法。”(《泰州有个作家群》)如今里下河地区的写作者“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写作没受过汪曾祺的影响”^①。

我们不妨从里下河文学流派代表性作家的表述中窥探汪曾祺文学传统对他们的影响。王干坦言:“那个时候非常迷恋汪曾祺的小说,他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审美的眼光,或者说能够鉴别文学的一个味觉……”费振钟说汪曾祺的写作属于“第三种写作经验,闲适”,“他既不伤时感世……也不踟躅于现实……假如有一类写作者,仅仅为着个人情趣和生命自足写作,那么

汪曾祺就是。”^②这应该说是切中肯綮。

刘仁前认为,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们集聚在“汪”字的旗下,与汪老在创作上“血脉”相连、“志”“趣”相投,作品充满“水气”和“汪味”。^③庞余亮在获得鲁奖接受采访时说:“我受到汪曾祺的影响比较大。汪曾祺的家离我们家很近,我们老家在解放前就属于高邮。所以我天然就对汪曾祺先生亲近。……晚饭花开了,就意味着要放学了。然后,晚饭花就成了我的学生,我的读者,我的伙伴,我就捧着汪曾祺的《晚饭花集》对着晚饭花朗读,这是一本我读了不下30遍的书。我相信,汪曾祺先生那些有晚饭花香的文字,早已一颗颗种到我的生命里了。”^④

关于什么是故乡,毕飞宇曾把自己和汪曾祺做过一个比较。“对汪曾祺而言,故乡是一群鸭子,汪曾祺把他们赶了出来。我呢,是找了一群鸭子,我把他们赶到了那个地方。”^⑤他在解读《受戒》时说:“在汪曾祺看来,这个基本面才是文学最为要紧的重大题材。具体一点说,那就是日常,那就是饮食男女。落实到《受戒》这篇小说,他的基本面就一个字,爱。……落实到小说的文本上,那就是两条:一、轻逸;二、唯美。”说到小说的少年视角时认为:“这样的视角可以最大限度地呈现少年的懵懂与少年的无知,这样的写法有一个好处,它成全了美,这样的写法也有一个坏处,它规避了理性。”^⑥这些真知灼见,可谓深得汪氏小说三昧。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刘仁前的《香河》,庞余亮的《丑孩》,顾坚的《青果》,刘春龙的《垛上》都是以一个少年视角来看待周遭现实世界的。所以刘春龙说:“我们惟一可以选择的纪念方式,是把先生的文脉延续下来,把先生的精神传承下去。”^⑦这种自觉传承的文脉与精神,就是汪曾祺开创

①②⑤⑦ 刘春龙:《隔壁的汪先生》,刘仁前主编:《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丛书·散文卷2》,第148、148、148-149、150页,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

③ 舒晋瑜:《刘仁前:我的写作一开始就打上了“汪”字印记》,《中华读书报》2013年10月16日。

④ 舒晋瑜:《庞余亮:得了鲁奖的小先生》,《中华读书报》2022年10月26日。

⑥ 毕飞宇:《小说课》,第148-149、172-1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的里下河文学传统。

纵观里下河文学流派后来者的创作,可以说,汪曾祺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魂,有了汪曾祺,里下河文学流派就有了一个核。汪曾祺融合了儒家诗教传统里追求“和谐”的审美理想以及“有益于世道人心”创作目的,这显然深刻地启发了里下河文学的后来者。王干在《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学》里认为汪曾祺从题材上、结构上、哲学上建构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特质:风俗画、散文化、大悲悯。^①笔者曾尝试从汪曾祺文学传统角度来探讨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审美特质,认为汪曾祺小说立足边缘和民间,为能工巧匠、市井能人等普通人立传,充溢着“中国味儿”和里下河水乡气息,标志着里下河文学美学的独立。汪曾祺的文学传统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风俗化的场景描写、回溯式的叙事视角、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边缘化的民间立场以及小说文体的创新等,奠定了里下河文学流派形成的基础,开启了里下河文学的文化风格。^②后续的里下河文学流派作家们,大多踵其文学踪迹,以其为文学旗帜,力图写出自己的里下河文学作品,不断塑造里下河,同时力图形成对汪曾祺的突破,共同构建了里下河文学的审美风格。

结语

毫不夸张地说,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崛起,丰富了江苏甚至中国当代文学的地理版图。里下河文学可以作为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样本和窗口,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里下河文学中不同文学类别的发展十分均衡,不同代际的作家创作实绩不凡。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甚或书画创作,齐头并进;40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作家同场竞技;不同文学理念和创作方法交相辉映,诗骚与史传传统杂糅。同一作

家各类文体兼擅,琴棋书画各类才艺皆通,具有古代文人特点和鲜明的才子气。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作家,各自以特有的方式,直接参与并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

但是,有必要重申一点,我们研究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学,并非建立文学地方军,而是要通过地方性的表达,将地方性和世界性融为一体,重新获得文学在当下的价值,其目的在于通过一种“地方”认知来获得文学的新增长点,从而在当今文学边缘化的危机中,以其地方视野向当代中国更好地发声,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里下河文学流派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文学流派,她的审美风格也在不断演变与丰富。我们要时时重温汪曾祺的话:“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③随着我们对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学流派的研究不断深入,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后起之秀以里下河话语来讲述里下河故事,表达里下河经验,进而讲述新时代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课题“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学流派研究”(21SYC-18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生民,文学评论家,扬州市职业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及思想史。

-
- ① 王干:《汪曾祺与里下河文学》,《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第158-159页,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
 - ② 孙生民、姜广平:《当代里下河小说创作与发展概观》,《文艺评论》2020年第4期。
 - ③ 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9卷谈艺卷,第4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